

浅析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创设

在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发展历程中，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创设和发展是不能忽略的。它于 1898 年戊戌变法时预备筹建，但因戊戌政变而夭折，直至 1902 年在清末新政的大潮下才正式设立。1904 年，根据《奏定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1908 年，清政府又按照张之洞等人建立分科大学的建议，把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并于该年十月迁至五城学堂旧址，是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从最初的筹建，到后来的复建，再到后来的改称，乃至最后独立设置的变迁过程，无不与清末师范教育的摸索前进休戚相关，同时也折射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兴起时的举步维艰和蹒跚前行。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 1898 年 6 月，是光绪皇帝在“定国是诏”中作为百日维新的第一项改革措施下令创办的，是在戊戌维新中诞生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它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进展，而该校师范馆的创办又是中国近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开始。然而，在京师大学堂创立之初，时任管学大臣的孙家鼐，只设了一个仕学院以教进士举人，计划设置的师范斋并未付诸实施。1900 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德俄军队占据京师大学堂校舍作为营房，大学堂被迫停办了近两年，直到 1902 年 12 月 17 日才复校重办，并根据《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西国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中国向无此举故省学堂不能收效。今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人才”的规定，造成京师大学堂开近代中国重视高等师范教育的先例，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在科举制度根深蒂固的影响下，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设时的招生条件和毕业奖励都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连。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上谕：“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京师首善之区，尤宜加意作养，以树风声。从前所建大学堂，应即切实举办。”并“着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应如何裁定章程，并著悉心妥议，随时具奏。”根据上谕，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便尽力整顿大学堂，着手制定大学堂章程，拟仿行日本学制，设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等 7 个专门分科，但考虑到大学初办，没有合格的生源，因此采取大学堂先设预备科，培养预备生为大学堂专门科提供生源。又考虑到当时中国新型人

才缺乏，各方面人才急需，而有一定学识的士子求学若渴，所以应该兴办速成教育，于是先开设了师范与仕学两速成科，并规定举贡生监等可以考师范馆。大学堂“应请于预备之外，再设速成一科。速成科亦分二门：一曰仕学馆，一曰师范馆。凡京员五品以上，皆准应考，入仕学馆。举贡生监等皆准应考，入师范馆”。在届定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生源的基础上，张百熙还规定了师范馆学生的学习年限和毕业时的奖励定位：“师范馆三年毕业学有成效者，由管学大臣考验后，择其优异，定为额数，带领引见。如原系生员者准作贡生，原系贡生者准作举人，原系举人者准作进士，均候旨定夺。准作进士者，给予准为中学堂教习文凭；准作举贡者，给予准为小学堂教习文凭。”1902年8月15日（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将学习年限延长了一年，并进一步指出“师范出身一项，系破格从优以资鼓励”。这个钦定学堂章程虽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师范毕业生的出身奖励和就业定位，还没有涉及师范毕业生的服务义务和年限，但它毕竟将师范教育列入议事日程。

在科举与学堂并存的情况下，师范馆直接招考的学生为数有限，被迫改用其他途径陆续招收学生，从而导致学生入学时间不一，给教学进度带来很大影响。1902年（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京师大学堂在钦定学堂章程的指导下重新开始招生，仕学馆录取了57名，师范馆录取了79名，“甄录材颖，俾当其选”，而且“只有仕学师范两馆”招生。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于1902年12月17日开学，开学后还陆续接收了一些其他途径进来的学生。由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时有进出，在学学生人数，根据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京师大学堂同学录》的记载，共有195名师范生。这195人由三种途径进入师范馆：第一种是考取，即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在开办时，对愿投考者在京直接进行考试，在这里有76人是通过考取入学的；第二种是咨送，即由各省择选保送，其中咨送生80人；第三种则是译学馆拨入，由译学馆拨入的有39人。由于入学途径不同，他们的入学时间也不相同，“兹特揭入学先后之概例于下：（一）凡下注考取者，俱壬寅（即1902年）冬入学；（二）凡下注咨送者，除直隶、奉天、山西、山东、浙江五省系壬寅（1902年）冬入学外，余俱癸卯（1903年）春夏间入学；（三）凡下注译学馆拨入者，俱癸卯（1903年）九月入学。其有不属此例者只少数耳”。

师范馆学生第一学年学普通课，分习英、法、德、俄等外文和普通科学，日语是公共必修科。第二年正式分科学习，共分四科，亦称四类，第一类以中国文学、外国语为主（学生可选修英、法、德任何一种）；第二类以中外地理、历史

为主；第三类以数学、物理学、化学为主；第四类以植物、动物、矿物、生理学等博物科为主。他们在分类学习之外，还要通习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等科目。

1903年，中国人民为反对沙俄霸占我国东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也投入了这场反帝运动。他们集会演说，还根据会议商议的办法，上书朝廷请求严拒沙俄，但遭到腐朽清廷的镇压，学生们义愤填膺，转而强烈要求清政府提前兑现《钦定大学堂章程》内“学堂开设之初欲求教员，最重师范。现于速成科特立专门之外，仍拟酌派数十人赴欧美日本诸邦学习教育之法，俟二三年后卒業回华为各处学堂教习”的规定，和京师大学堂校章关于“毕业后选派出国造就师资”的承诺，提前派遣他们出国留学。张百熙亦根据日本明治八年（1875年）选优等学生留学外国，至明治十三年（1880年）留学生毕业归国，多任为大学堂教员，迄今“人才众多，六科大师，取材本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情况，他认为：“固知中国大学分科，照目前物力士风而论，求其规制完备，程度高深，恐非三四年所能猝办。”因此，他指出：“环顾举国属望之切，精神所注，终底于成，亟应多派学生，分赴东西洋各国，学习专门，以备将来学成回国，可充大学教习。”他奏请清廷同意早派学生出国游学，并指出越早越好，“早为之计，应用无穷，及今不图，后将追悔”。经过多方努力争取，清政府终于同意京师大学堂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选派47位学生出国留学，其中在1903年《京师大学同学录》上可查证的师范生有31人，这是京师大学堂第一次派遣师范生出国留学，也是近代师范教育史第一次大规模的官派留生活活动。这31人分别派往东西洋，其中顾德邻、王桐龄、成俊、唐演、王舜成、刘成志、蒋覆曾、黄艺锡、苏潼、朱深、杜福焯、吴宗拭、冯祖荀、钟赓言、周宣、刘冕执、朱炳文、景定成、陈发檀、陈治安、张耀曾（在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的北洋政府时期任过司法总长）、席聘臣、何培琛23人派往日本，于1904年初（光绪二十九年底）出发。周典、孙昌焯、华南圭、薛序镛、魏渤、俞同奎、何育杰、潘成福8人派往西洋，于1904年年初启程。派往西洋的孙昌焯，在1906年的同学录与1907年的师范旧班毕业生题名录内都有其名。这次派遣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出国留学，是学生和管学大臣多方努力的结果，它不仅为我国师范教育培养了人才，而且也为中国的留学教育提供了经验。

（作者阮春林，中山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转载自《历史教学》，2004年4期，原文有删减。）